

关于宋玉评价中的一个问题

邓元煊

对宋玉作出总的评价的，首先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宋玉“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这已为多数人所公认。然而“终莫敢直谏”这五个字的评语，至今上下两千年，似乎也成了定论，这却是我所不敢苟同的。

先就司马迁这五个字来看，“终”，自然是始终、一贯；“莫”，无指代词，没有谁，既指宋玉，也包括唐勒、景差。那么，至少有两点值得重新探讨：一、宋玉是否始终如此？二、屈原在当时是有影响的，那“既死之后”，当时就没有人能继承他的精神了吗？再从整个《屈原列传》来看，司马迁对屈原作出了高度评价，而以宋玉等作陪衬，借以突出屈原，并对屈原的死和楚国的灭亡寄予无限的同情和关注。“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一个“竟”字与“终”字相呼应，在这深沉的慨叹里，显然至少是把楚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宋玉们的“莫敢直谏”了。也正因为如此，后世的人们在贬责宋玉的时候才往往引用这五个字作为颠扑不破的论据。这自然与事实是大相径庭的，要宋玉等来承担楚国灭亡的

责任，即使是一部分责任，都是不公平的。

据近代人的研究成果，屈原的生卒年大约在前340年—277年，他历经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王朝，但其政治和创作活动主要在怀王统治的三十年间。这时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遽过渡，由乱世趋向统一的历史转折关头，各国间斗争异常激烈。当时已由春秋初年的五十多个小国兼并而成所谓战国七雄，而七雄中又以楚、秦力量为最强。苏秦“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一语，正是对此时形势的准确概括。怀王在统治初期，也曾有过图强的要求。史载：“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怀王为从长。”（《史记·楚世家》）这时屈原正是二十二、三岁，风华正茂之时，他对祖国的深厚的爱便倾注在怀王身上，提出了修明法令、联齐抗秦等一系列主张，为实现楚国富强、统一中国的理想而奔走先后。由于他爱国思想的深厚，对当时形势的深刻洞察，因此在后来怀王昏庸、群小当道、国势日衰的情况下，仍能不改初衷，并继续求索，有着“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据《屈原列传》记载，说他“博闻莫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

侯，王甚任之”，看来这并非虚饰之词。屈原能够这样受到重用，曾有这样一展宏图的良机，固因为他与初期的怀王政见的契合，也要看到他的身分和地位所起的作用。他是“楚之同姓”，是当时屈、昭、景三大姓之一，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建、屈丐等在楚国莫不身居要职。他曾做过三闾大夫，督导王族同姓，管制贵族宗人。他曾“为怀王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在朝内主持“造为宪令”，对外承担出使齐国重任。没有这样的身分和地位，他是不可能在内政、外交上干一番事业，有所作为的。没有这样的身分和地位，他也不会有“直谏”的众多机会去表现他“敢于直谏”的气魄和勇气了。

宋玉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也显然没有屈原这些的际遇。关于宋玉的生平，据现在能够看到的几段材料，已很难确考了。《新序·杂事第一》说他是楚威王时人，《北堂书钞》卷三十三《宋玉集序》说他是楚怀王时人，《新序·杂事第五》又说他是楚襄王时人，前后互相抵牾。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屈原列传》），班固说“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汉书·艺文志》），王逸则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楚辞章句·九辩序》）。是否是屈原弟子难以确考，但根据汉人这三种提法，宋玉的主要活动时间在屈原之后，即顷襄王时期，恐怕是无疑义的。顷襄王本与党人为一丘之貉，国事遂一蹶不振，楚国逐日走向灭亡的绝境。据《屈原列传》载：“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于兰，又咎于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逐，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由于完全抛弃了联齐抗秦的战略，且再次放逐了良臣屈原，楚国国势便每况愈下了。楚国之衰败、灭亡已成定局。宋玉正处在这君王昏愦、谗佞专权、祖国多难

之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要想有所作为，那就难上加难了。宋玉在政治上之不如屈原，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再者，宋玉既非楚王同姓，又无“左徒”这样的高位，与屈原的身分和地位也迥然不同。关于宋玉的身世也已难以确考。《新序·杂事五》云：“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刁凿《襄阳耆旧记》云：“宋玉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宋玉集序》则言“宋玉事楚怀王——友人见之王，王以为小臣”。看来“楚怀王”的记载有误，《韩诗外传》就易“楚怀王”为“楚相”；是否始事屈原、继求景差已不可考，但做过小臣，很不得志，或是事实。王逸《九辩序》说：“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据此，宋玉由小臣进而为大夫，这是有可能的，但地位也不高。所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由于地位不高，又“不见察”，看来他在任职期间是不可能有所建树的。至于是否敢于“直谏”，后来为何“失职”，材料不足，不能瞎猜，但至少他与当道者是不合的，“意气不得，形于颜色”，并非谄媚取容之人。在失职以后，他的身分和地位更低下了，境遇也更加难堪。多数人公认为他的代表作的《九辩》中写道：“怆怆怆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这可以和以上记载相互印证，看来他确曾任过职，但后来失职了，因此内心很是愤愤不平。又写道：“时蹇蹇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这是说人已过中年，久留在外而毫无成就。还写道：“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

见乎阳春。”诗中固难免夸饰之词，但无疑诗人中年以后的处境是相当困窘的。在这样的境遇里的宋玉，还要对他提出“直谏”的要求，这就确乎勉其为难了。假若还要宋玉来承担哪怕是一小点楚国灭亡的责任，那就更是苛求了。试问，与楚王同姓，身居左徒高位的屈原尚且一再被疏被逐，最后不得已以身殉国，而先是沉抑下僚，后又失职被弃的宋玉，又怎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问题的关键是，宋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可惜留下的可靠材料不多，根据上述材料还很难说明问题的本质，看来最能说明问题的自然只有那篇《九辩》了。屈原在《离骚》中曾写道：“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国势飘摇、群魔乱舞之际，大浪淘沙，确有不少的人变节了。但是，屈原“与日月争光”的精神不朽，后继有人，应该说宋玉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对《九辩》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摇落深知宋玉悲。”（杜甫《咏怀古迹》）《九辩》的确大量地抒写了个人的失意和悲愁。“悲哉，秋之为气也”，作者一开始就极力渲染了肃杀衰败的深秋景象。全诗以秋景、秋物、秋声、秋容为背景，鲜明地衬托了抒情主人公的穷困处境和苦闷抑郁的满腹牢愁。“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岁忽忽而遒近兮，恐余寿之弗将。”……人过中年，百事无成，被谗遭贬，志不得伸，贫困交加，痛不欲生！这也就无怪乎杜甫“遥望千秋一洒泪”（同上）了。

显然，全诗的感情情绪是很重的。但是，这决不是“风流才子”的无病呻吟，

也决不是落魄文人的绝望哀叫。一篇古代作品是否仍有思想价值，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写的是个人的失意与悲愁，而要看这种感伤情绪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受着怎样的思想动机的支配。也就是说，要着眼于抒情主人公对当时的现实是否有清醒的认识，是否把个人的哀怨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否始终保持着自己高洁的品德等等。这是评价古代“伤痕文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不然就会否定了不少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而在今天仍有认识作用的佳作，那是十分可惜的。

即以被誉为“千秋绝调”（王夫之语）的“悲秋”来看，朱熹就曾指出过它的深刻的社会意蕴：“秋者，一岁之运盛极而衰，肃杀寒凉，阴阳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时，有似叔世危邦，主昏政乱，贤智屏绌，奸凶得志，民贫财匮，不复振起之象。是以忠臣志士，遭谗放逐者，感事兴怀，尤切悲叹也。”（《楚辞集注》）他没有把“悲哉”的感叹仅仅看成是作者因秋景的触发而产生的个人哀怨，而是认为那幅凄怆的深秋图景正象征着当时楚国社稷“不复振起之象”，因此这一动人心弦的感叹中也包含着对时代的感受，寄寓着对国事的隐忧。这是颇有见地的。统观《九辩》全诗，作者确乎不仅倾诉了个人内心的哀怨，而且唱出了一曲乱世的哀歌，唱出了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和对君国的眷恋深情。反复吟诵，仿佛聆听到当时时代微弱的脉搏和诗人发自心底的颤音。

“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徂偃。”不难看出，作者对当时的黑暗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被谗遭贬的社会原因是有深刻体察的。“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毁誉之昧昧”，“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他对当时楚国谗佞当道，

倒行逆施，蒙蔽君王，迫害忠良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对君王自然更多的是眷恋，所谓“尝被君之渥洽”，“窃不敢忘初之厚德”。但是，他已经清醒认识到自己遭遇的更深一层的原因，把批判的矛头含蓄地指向了楚王：“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蹰而远去。”在引用到几个历史掌故的时候，也隐约地透露出对君王的不满：“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窃美申包胥之气盛兮，恐时世之不固。”“宁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无伯乐之善相兮，今谁使乎誉之？”深感时世不同，当今执轡非人，伯乐无有，际遇不佳，这不能说不是有所指的。

“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嚉廓而无处。”诗人遭贬后处境极端艰危，内心极度苦闷，但依然不改初衷，并未因此而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以求瓦全。“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饕而妄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吃“嗟来之食”，这是他恪守的信条。“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仰慕诗人遗风，以义为重，不媮不苟，保持着耿介高洁的品格和节操。身处乱世，又堕入困顿之中的宋玉而能至此，不能说不是谁能可贵的。

“众蹀躞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去夫缓耕而容与兮，窃悼后之危败。”他目睹群小蝇营狗苟，结党营私，国家残破，政治经济危机皆日趋严重，预感到国家的危亡，因而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他继承着屈原遗留下来的“美政”思想——“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在逆境中仍念念不忘的是：“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

教”，“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他仰慕“先圣”、推崇“尧舜”，深知只有修明法度，举贤授能，才能使国家有复兴的希望。因此他严厉斥责群小举措乖张：“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何时俗之工巧兮，背规矩而改凿”；他因未遇“伯乐”而感伤，对“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的现实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尤其是他还象屈原一样，“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列传》），表白了对君国的一贯忠诚。他要去乡离家了，在“心烦愴兮忘食事”的极度烦闷的境遇中，在深知“君之心兮与余异”的情况下，仍然“专思君兮不可化”，“愿一见兮道余意”。在决定将“去君而高翔”的时候，内心极度悲痛，但仍“愿一见而有明”。他在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的情况下，仍然忧心国事，渴望能有所建树：“事蹇蹇而觐进兮，蹇淹留而踌躇。”“愿沉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最后他想象超脱现实，遨游太空，但仍不忘君国，对楚王表示了良好的祝愿：“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玉并不是屈原的叛逆，而是忠实地继承了屈原的思想和精神的。他没有沉沦在个人的忧怨之中，而是把个人的忧怨与楚国的命运高度融合在一起，反映出自己的理想、志趣和深挚的爱国情思。他内心有矛盾，有时还产生了剧烈的波动，甚至想超脱现实，但他终于还是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与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王逸评《九辩》的结尾说：“愿楚无忧，君康宁也，言己虽升云远游，随从百神，志犹念君，而不能忘也。”（《楚辞章句》）以此同《离骚》结尾相较，颇有异

曲同工之妙。王夫之云：“玉虽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愍一于君国，非徒以阨穷为怨尤。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楚辞通释》）象这样来评价《九辩》的思想意义和宋玉其人，是不为过誉的。

宋玉自然不是完人。他把君王当做了国家的象征。把忠君和爱国混为一体，对君王的指斥有很大保留，反映了他决不可能突破的阶级局限性。其实，屈原和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爱国者又何尝莫不如此呢。如果把屈原的“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说成是爱国，而却认为宋玉对国君的眷恋是“卑顺”，甚至是弄臣献媚，那是不公平的。诗中的感伤情绪的确太重，从现在的眼光看来，它的确不能起到促人奋发的作用，而这也不过只是反映了他决不可能逾越的历史局限而已。鲁迅先生就曾指出过，《离骚》等作品，“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篇未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坟·摩罗诗力说》）。《离骚》尚且如此，对《九辩》自然更不应提出更多的苛求了。

关于“直谏”问题，《九辩》也作出了回答。由于宋玉的地位和身分所决定，加之以被谗遭贬，要想见君实在难上加难。“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因此只能“仰浮云而永叹”。尽管如此，他仍不甘寂寞，有话还是要讲：“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下面一节更道出了他想“直谏”而又未能“直谏”的原因，具体地展示了自己内心的波折：“愿自直而径往兮，路壅绝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驱兮，又未知其所从。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桡而学诵。性愚陋以褊浅兮，信未达乎从容。”可见，他并非随波逐流，阿谀奉迎之辈，到是一个深忧国事，颇有点骨气的人。因此，不具体地分析具体情

况，概谓之曰“终莫敢直谏”，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至于有人说诗中政治感情强烈的语句是外加上去的，是抄袭屈原的，并非宋玉的真实思想，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这首诗艺术创作的独创性突出表现在，它不象《离骚》那样“直抒胸臆”，而是写景以制造氛围，创造意境，从而抒发感情，展示情怀，使情景水乳交融。因此，怎能把情和景割裂开来，而把表情达意的语句说成是硬贴上去的呢？鲁迅先生说：“虽驰骋遐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这种感情正是通过情景交融的意境而展现出来的。有人做过一次统计，指出抄袭有十三处之多，抄自《离骚》、《哀郢》、《惜往日》、《思美人》等四篇。细致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他只是袭用了个别词句和典故，且运用的语言环境与屈原迥然有异，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和屈原不完全一样，这怎么能说是抄袭呢？只应看作他是深受屈原的影响的，或者是在屈原精神的感召下写作成篇的。作为一首政治抒情诗，其中个别词句和典故与自己景仰的前辈雷同，恐怕这也不乏其例，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何况，《九辩》在艺术上颇有独创性，这已是为大家所公认了的呢。

《九辩》写于“去职”以后，那么宋玉“任职”时的情况是否也能从他的其他作品里找到证据呢？关于宋玉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载“《宋玉赋》十六篇”，却连篇名也没有列。《隋书·经籍志》载“《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宋玉集》二卷”，也都没有列篇名。《宋史·艺文志》便不见著录，可能宋元之际《宋玉集》就已失传。现在相传的宋玉作品，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招魂》和

《九辩》，《文选》所载《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古文苑》所载《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以及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据《文选》江淹《杂体诗》注引《宋玉集》增辑的《高唐对》，共计十四篇。《古文苑》上的六篇皆后人伪托，宋人章樵已提出质疑，可以置之不论。《高唐对》与《高唐赋》开头一段略同，亦可不议。《招魂》作者问题早有争议，如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马其昶《屈赋微》以及梁启超《屈原研究》等都认为是屈原的作品。若假定为宋玉作品，应是写于“去职”以后，这对评价宋玉却是十分有利的。王逸云：“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懣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楚辞章句》）作者“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欲召魂魄，来归修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以极深情的口吻劝戒魂灵不要到天上、地下或四方去，认为还是楚国最好，只有回到自己的祖国才是最好的归宿。屈原写道：“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招魂》和《哀郢》表现了同一爱国主题，这就更足以说明宋玉是屈原的忠实继承者，他的心和屈原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了。《文选》上的几篇的作者问题，至今仍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如认为宋玉所作，从其内容来看，那应该也是他“任职”时期的作品了，值得仔细研究。我认为即使是这样，对评价宋玉也并非十分不利的。这组作品就其内容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宋玉对来自各方面的诽谤理直气壮地据理力争，以明己志。当时，宋玉不仅受到同僚大夫登徒子的攻击，说他“为

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而且“士民众庶不誉之甚”。面对这些攻击，他并没有屈服，而是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向上申诉。《对楚王问》是回答“士民众庶”的非难的。所谓“士民众庶”是指各阶层的人，而锋芒所向显然是针对谗佞的群小和世俗的颓风的。他先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形成鲜明对照：把自己比作“引商刻羽，杂以流徵”，而把群小比作不识曲调的听众，因而“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把自己比作鸟中之凤和鱼中之鲲，“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把群小比作“藩篱之鷃”和“尺泽之鲋”，不知天高海阔。然后点明主旨：“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这与《离骚》“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的诗意是一致的，正表现了他对群小的藐视，决不同流合污的高洁的志趣和情操。《登徒子好色赋》则是针对着登徒子的。登徒子连别人“体貌闲丽”都加以攻讦，的确是心思费尽。“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一一加以申说。“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一句毫不隐讳地道出自己是继承了前辈（自然也包括屈原）的遗风的。在楚王追问之下，他才就所谓“好色”问题进一步作了申辩，章华大夫也说“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屈原曾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而群小以“近女色”诬屈原倒行逆施。宋玉与屈原当年的处境有相同之处，而本篇也显然是假托一段对白来回敬妒贤嫉能的群小，表明自己的心志的，登徒子也可能就是一个虚拟的箭靶。因此，不能说是什么“一面之辞”，更不能说是颠倒黑白地攻击登徒子。

二是借接触君王的机会，对君王巧妙地进行讽谏的。关于《风赋》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但把它说成是阿谀奉迎、吹牛拍马的帮闲文学，根据是不足的。《文选》吕向注云：“《史记》云：宋玉、郢人也。为楚大夫。时襄王骄奢，故宋玉作此赋以讽之。”从现存司马迁《史记》中找不到这句话，吕向所据者何不得而知，但这个意见还是值得注意的。他是借风来对楚王进行讽谏的，把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不过是借以寓意。文中对这两种风所经过的地方和历程作了细致的对比描写。写雄风、极力铺叙了宫殿生活的豪华，写它“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其中人状是“清凉增欷”，以致起到了“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的奇妙作用。写雌风，则具体形象地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悲惨，写它“塏然起于穷巷之间，……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其中人“状直慄混郁邑，驱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啗齧嗽获，死生不卒”，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简直是一场特大的灾难。两相对照，这就明显地反映出统治者和庶人百姓两个世界、两种天地不同生活。这对“骄奢”的楚王是不无讽谏作用的。至于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高唐赋》和《神女赋》，章太炎先生认为“本一赋分为上下”（《薊汉闲话》二十五）。杜甫《咏怀古迹》有云：“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杜甫是认为并非痴人说梦，而是有所寓意的。但寓意者何，他没有说，只是觉得实在令人遐思。《高唐赋》末有“往自今，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的话，是否果有讽谏之义呢？王闿运《楚辞释》和章太炎《薊汉闲话》里还联系当时的国事进一步作了探索。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过，

这些作品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应制之作，这一点恐怕是可以肯定的吧。

从以上的粗略分析不难看出，宋玉在“任职”期间并非轻薄无耻之徒。登徒子也说他“口多微辞”，看来他确非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之辈，他还敢于顶逆流，敢于碰群小权贵，并能借与楚王可能接触的一点机会进行讽谏，即使是“曲终奏雅”，“劝百而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吧，也应该说是值得称道的。自然，这组作品的确还不能证明宋玉在“任职”期间是“敢于直谏”的。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还是必须“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才有可能还宋玉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日“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风赋》），一云“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高唐赋》），看来宋玉在当时地位确实不高，也不受重用，不过作一个待从之臣，被楚王“俳优畜之”而已。处于这种身分和地位的宋玉，在正式场合不可能有多少接触君王、发表意见的机会和权利，在君王游观之时作一待从，要“敢于直谏”也势必不能。加之，有登徒子“短”于前，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于后，楚王又昏庸到极点，环境阴暗险恶，动辄得咎，一定要用“直谏”来要求他，未免太苛求了吧。此时，他能够通过大自然的描绘以抒发感受，或“人情不能相舍者，莫如男女，故以狎爱之辞为喻”（章太炎《薊汉闲话》）。寓讽谏于“从容辞令”之中，“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屈原列传》），这还是应该肯定的吧。在乱世而能不忘“所学于师”，这样的人又能有几？因此，我觉得宋玉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对宋玉在当时的表现横加责难是不恰当的。

再分析一下“士”在当时的情况，这个问题也就更清楚了。“士”是当时一个新兴的阶层。（下转50页）

义的性质。为什么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始终着重援助国民党，而对共产党却并未给予有力的支援呢？为什么始终以国民党为中心，以共产党为助手呢？因为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才成立不久，影响不大，力量薄弱；而国民党斗争历史长、影响大，又有一批归附于它的武装力量。这就使苏联感到国民党是一股值得扶植的力量。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力量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前途，那是第二位的问题。当然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本质认识不清，对其核心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等的政治态度估计过高，也是发生上述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采取过分倚重国民党的政策，以致后来眼看着国民党一步一步走上反动的道路而无法控制，结果导致了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当然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力量过于强

大，革命力量弱小；国民党右派的叛变；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其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等等。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所犯的严重错误，不能不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注释：

- ① 《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
- ②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
- ③ ⑪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03，204页
- ④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5页
- ⑤ 《宋庆龄选集》第109页
- ⑥ 邓中夏《我们的力量》，见《中国工人》第二期
- ⑦ ⑨ ⑬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1,150,213页
- ⑧ ⑩ 《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案》
- ⑫ ⑭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 ⑬ ⑮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上接第10页）

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也代表着当时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当时，各封国的执政者和权相们为了富国强兵，都争相养士，广泛罗致人才，形成了士的两个特点：一是依附性，即他们必须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依附于一定阶级的代表——国君或权相，才有可能生存和发挥作用。因此，宋玉之忠君，宋玉对君王的某种程度的顺从，固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性，但也是必然的。二是“士”在当时的地位很高，影响也是很大的，各国统治者都需要，“朝秦暮楚”者大有人在，如宋玉另有所图、改换门庭也并不怎么困难。但是他在国难当头，身居下位，而又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没有离开自己多灾多难的国家，而且还深忧国事，竭尽忠诚，这是不应该受到非议的吧！

由是观之，宋玉当时之“不敢直谏”，确实是有原因的，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优点，但在当时他能作到这样一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实在不应该由此而对他作出否定的评价。至于其他奇闻逸说，贬之者多而褒之者少，但不足为据。后来不少骚人墨客，感事伤怀，吟诗作赋，称引宋玉者不少，但要作具体分析，其中确有不少无病呻吟之作，但那是宋玉所始料不及的，责任自然不在宋玉。

从宋玉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所反映的精神境界来看，较屈原确实“略逊一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已如上述。但宋玉作品，确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亦甚有可喜之处”，宋玉其人总的说来仍不愧为屈原的忠实的继承者，如杜甫那样，“屈宋”并称也亦无可（《戏为六绝句》）。这就是我的结论。